

落英（上）

——早年讀書生活的回想——

魯 堯

南京大學

序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陳白塵先生就開始寫回憶錄，出版一本就送我一本，計有《雲夢斷憶》、《寂寞的童年》、《少年行》，讀後饒有興味。陳先生平反後做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期間，像我這樣的年輕教師有時也跟他聊聊天。他談起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時候，張春橋以一個落魄青年從山東來到十里洋場，拿着友人的介紹信投奔陳先生，陳先生安排他住同一樓，張春橋跟蕭軍打架，參與決鬥，張來上海一個月，床下就有一木箱子新書，是從書店偷來的……四九年四月解放軍過了長江，為解放上海做準備，在丹陽組建上海的領導班子，張春橋打聽到陳先生還留在上海，臉色就變了。陳

先生在文革中的冤案同張春橋的「忌諱」密切相關。古往今來，富貴以後就怕貧賤時的隱私被人知道，大概是「常規」了。陳先生也談起過三十年代的江青。我們後生都盼他把回憶錄全寫出來，快寫出來，可惜的是陳先生老而病重了。一九八八年初夏，呂叔湘先生到南京來，我建議他寫回憶錄，並舉陳白塵先生為例。呂先生說：「他經歷多豐富！我們是書生。」

在中國，寫回憶錄的都是大人物或者是經歷豐富而且也要有相當地位的人，像我這樣的一介書生（或者用這二十年來的新詞兒「一個老九」）即使寫了回憶錄，也沒有什麼使人感興趣的內容，更談不上發表和出版了。而京都大學平田昌司先生的研究課題之一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語言生活和讀書生活的轉變，平田先生說，中國那麼多學者寫了許多許多書，極少談到這方面的問題，偶或興之所至，也是語焉不詳，寥寥數筆。平田先生要求我談談自己的早年的讀書生活。一九九零年秋我應東京大學平山久雄幾位先生的邀請，游學日本。一九九一年二月至四月至京都訪問，四月十二日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主任教授興膳宏先生和平田昌司

先生以「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讀書生活」為題令我講自己這方面的經歷，講演後又令我回國後充實寫成文章，我越發誠惶誠恐，愧不敢當。然而盛情難却，只得硬着頭皮在暑日中寫這篇「遵命文章」了。

既然要作為文章發表，就得有個有點文學味兒的題目。

關於早年的回憶錄，我覺得無過於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書名也是最好，有詩意，句內對，又是「平平仄仄」，妙不可言。我要寫的其實也是朝花夕拾，但是總不能剽竊大文豪的題目吧，雖然他是我們魯家的外甥。本擬襲用他的意思，叫《落英繽紛》，回憶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不免有點甜滋滋的味兒，某些地方還要陶醉起來，「流連忘返」，但是一當清醒時，自己也覺得並不「繽紛」，他人看來更不「繽紛」了。乾脆就叫《落英》吧，簡潔。將思緒從幾十年前拉回到現實的立足點，「落下即實地」，就「黯然神傷」地念出一些句子：「流水落花春去也」，「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老冉冉其將至兮」，「人何以堪」。好吧，就掙拾起以下的這幾瓣落英吧。

一個人的經歷為他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所規定，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中國江蘇省泰縣溱潼鎮，這就是我的經歷的時空起點，從此就延伸為一條長長的線，而且是條長長的曲線。

我是個書生，只能談談讀書的經歷，這裏主要談我童年、少年及「青年早期」的讀書生活。也許有人要奇怪，什麼叫「青年早期」？「青年」歲數的上下限是多少，我沒去查文獻，熟知的資料有兩條：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現在把下限定為四十五歲；今年春，國家教委下令高校的青年教師要下基層鍛煉，並認真學馬列，開出了一批書單，我熟悉的一位教師說，他剛好三十五歲過一個月，可以不下去了。本文回憶讀書經歷不打算敘述到這麼長，就講到青年的早期吧。

大約是一九六二年吧，我在北京大學做漢語史研究生，當時的研究生班聯會主席孫文光請得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來做報告，講讀書、治學方法，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數年

後死於非命。吳晗說他小時讀《左傳》，必須背，背新的時候同時把舊的全背一遍，比方說，背第三十篇的時候，同時把第一篇到第二十九篇也背一遍，所以《左傳》「到現在也還背得」。報告會後我和我的同學都深為嘆服：「我們怎麼也趕不上啊。」近時讀《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陳垣先生十二三歲以前就讀完了十三經，每晨四點起床讀書，至老不輟。像陳垣、吳晗這樣的讀書經歷，我們有些師輩是這樣的，但是在像我這樣的五十多歲的一輩人中，就我所見所聞，大概還沒有吧。

各個時代的學人自有其時代的烙印，經歷也和地域、家庭有關，那就具體地談談有關我個人的讀書生活的問題吧。

江蘇是中國的膏腴之地，自孫吳、東晉開發以來，到了明清現代，經濟文化為全國之冠，號稱人文薈萃之地，座落在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廟側的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展覽廳正壁上有一則清代殿試資料，抄在下面（見下表）：

至于江蘇的文人學士，可謂之「車載斗量」，用我家鄉老百姓的語言說，「通把抓」。

不過江蘇也不可一概而論，論繁榮發達的程度，由南而

落英（上）（魯）

山東	直隸	安徽	浙江	江蘇	
6	4	9	20	49	狀元
5	7	7	29	42	榜眼
3	9	4	27	26	探花

北遞減，江南最盛，江淮間次之，淮北又次之。至今蘇北人還被蘇南人瞧不起，更被上海（清代上海屬江蘇）人瞧不起，上海姑娘都不肯嫁給蘇北移民的後代，連我這個「半老頭子」聽了都有點憤憤然。在江淮之間，西部又比東部強，那是因為大運河縱貫，又有座文化名城揚州的緣故。乾隆皇帝下江南時曾醉心於揚州的繁華，美術書法史上有著名的揚州八怪，乾嘉樸學的揚州學派的學者如阮元、王念孫、王引之、劉寶楠、焦循、江藩、劉文淇、劉師培等有如羣星璀璨，他們都是揚州府（與今揚州市所轄大致相當）西部寶應、高郵、儀徵、甘泉、江都縣人。

泰州處於揚州府的東邊，不叫縣，而叫州，但它是散州，相當於今日的縣級市。泰州歷史上的名人有元末起事稱王的張士誠，鹽販出身，白駒場（今屬大豐縣）人；本為鹽丁後來成爲泰州學派始創人的王良是安豐場（今屬東臺縣）人；柳敬亭，雖然明末清初很多大文人贈詩寫傳，但他是說書藝人，而且「一說通州人」；做過民國江蘇省長，編刻過《海陵叢刻》的韓國鈞是海安鎮（今海安縣）人。拉老鄉，攀名人，正在修地方志的各縣無不如此。泰州人真正可以引以自豪的是「當代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他三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曾到日本演出過，京都大學故吉川幸次郎教授曾有贈詩，據平山久雄教授說，日本人都用日語漢字音讀中國人的名字，雖毛澤東、周恩來亦如是，唯獨梅蘭芳用中文譯音。現在演員吃香，影后劉曉慶、笑星馬季不僅腰纏萬貫，他們外出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中央首長，更不用說教授了。一九八三年中國語言學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在合肥開罷，與會者遊黃山時，王力先生與侯寶林同下一輛轎車，相聲大師立刻被游人發現、簇擁，語言學大師却冷落在一旁。不過在解放前，泰州人把演員叫做戲子，一九五六年梅蘭芳率兒子、女兒回鄉演出時，

只找到一個姓梅的老家，是鬼木匠（扎紙房子燒化給亡靈的手藝人，可見門第之低了。在文化上泰州是比較落後的。

泰州民國後叫泰縣，不過老百姓還是叫泰州。解放後分爲泰州市和泰縣，分而合、合而分地開騰了幾次，總算在一九六二年分定了，不過泰州市還是縣級市。泰縣北半部是里下河水鄉，再往北就是鍋底窪的興化縣，今年的大水災損失慘重。泰縣東北部靠近東臺、興化縣處，有個溱潼鎮，土名存中，雅名雲水鄉，因爲四周爲碧水所繞的緣故，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就我淺識，「溱潼」之名，明萬曆年間泰州衛人陳應芳的《敬止集》卷首圖中標此二字。明末清初泰州詩人吳嘉紀（東臺安豐人，乾隆年間方由泰州析置東臺縣）的《陋軒詩集》有《溱潼詩》：「溱潼水霧中，屋上棲野鴨。藕花蓮葉遍里巷，野鴨飛下爭唼喋。有船田父皆爲漁，十口五口依孤蒲。蒲多村少心腸亂，網得大魚無米換。亭午風順客船來，烟生茅店人炊爨。可憐冷落紅顏婦，凶年賣飯不賣酒。」歷來字典上「溱」只音「臻」，例證是《詩經》的「溱洧」。一九六一年，我寫信給了聲樹先生說，泰縣「溱潼」的「溱」跟「秦」同音，如東縣「楸茶」（我大姐正在那裏工作）的「楸」和「奔」

同音，丁先生當時主編《現代漢語詞典》，從此中國大陸的字典「漆」有了又音。解放前漆潼鎮屬東臺縣，剛解放後會短期劃屬興化縣。泰縣人口過百萬，縣政府駐姜堰鎮，另一大鎮便是漆潼鎮了。漆潼現有人口三萬餘，但在五十多年前，只有幾千人。十分閉塞，交通全靠船，解放前我常到泰州，都是坐木船，要半天多。那時嫌慢，現在想坐木船而不可得了。倚坐于船艙內，觀看慢慢後退的兩岸景物，時而伸手劃撥着碧清的河水，頗為愜意。

我們家不是書香門第，出身寒微。小孩子的時候對臘月和正月有濃厚的興趣，臘月下旬送竈，父母在竈上舉行儀式（怎麼進行我已記不得了），要竈王老爺上天言好事，同時把堂屋裏家神櫃上的菩薩龜兒掉轉方向，背朝外，到三十晚上（即除夕）再正過來。我們魯家是臘月二十三夜（從陰曆十二月二十日起，當地話都稱「夜」，全天都叫「夜」）送竈，但也有不少人家是二十四夜送竈。小時候曾問過爲什麼，母親回答說：「軍三民四。」長大了讀書才知道朱洪武（民間對明太祖朱元璋的叫法）時分軍戶和民戶，媽媽說的「軍三民四」也許是軍戶二十三夜送竈，民戶二十四夜。後來又看書，了解到清代

也分軍戶和民戶，這跟明代制度有否因襲關係，我不清楚，如果具體而言，明代的某一軍戶不會到清代還是軍戶吧。我父母都生於清朝的最後幾年，我祖父母是半個清朝人，好像從他們身上看不出什麼「軍戶」的痕迹，看來我們魯家是明代的軍戶。以上都是在想當然的基礎上推論，是不科學的，我也知道，然而有什麼辦法呢？我請教過一位老年專家，他爲近幾十年民俗學的瀕於滅絕的境地而慨嘆。人們的習性總希望追溯到越古越好，但是我們漆潼魯家還沒資料可以跟「義不帝秦」的魯仲連、三國時的魯肅拉上關係，如果這送竈的日期真同朱洪武有關，也只能推到十四世紀。我小時候漆潼還都用燈籠，縱有電筒，也一定被看作希罕的洋貨，我五十年代還叫它電燈呢。我們魯家的燈籠上總有三個字「德月堂」，天下姓魯的很多，並不都同宗，大概同是德月堂的就算同宗吧，或者算一支，這又是個民俗學的問題，近年出版了些《中國文化史》，深入不到這些問題，非不爲也，實不能也。爲什麼叫做德月堂呢？因爲我們魯家有位祖上是個書生，可是窮得叮噠響，晚上只得在月下讀書，後來終於得了功名，所以取了這個堂名。他讀的當是木刻大字線裝書，

我十幾歲時曾經在月下試過，確能看見，但還是很費目力的，我這位祖上必定也是個近視眼。這位祖上是什麼時代人，大名，仕履，全然不知。因為就沒聽說過我們魯家有家譜、祠堂、族長之類的，怎能找到文獻資料做一番考證呢？連口頭傳說也沒有，只留下燈籠上的三個字作物證。我連曾祖父的事迹一點兒也不知道，我上一代的親屬中全是生意人，做店員或開小店，可見成爲「寒族」是好多代的事兒了。「出身寒微」四字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好多入求之不得的，現在則似乎諱言了。其「向對立面轉化」猶之乎文革時無不竭力隱瞞「海外關係」，而今若是「臺屬」，「港屬」，不僅「光彩生門戶」，而且自費出國留學就可以不需「服務五年」了。

我祖父叫魯璧成。趙元任先生在他的自傳裏說，稱上人的名字必須說「上某，下某」，他們趙家是官宦人家，講究禮數，我們魯家好像沒這個規矩。我祖父生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在鎮上擺棉線攤。清華大學電機系朱成功教授，抗日戰爭初期是高中生，全家曾逃難到溱潼，是我們家的鄰居，住了兩三年後，去昆明大後方了。一九五四年恢復聯繫，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上大學時見到朱叔叔，他說：「你爺爺

人真好啊，對我們外鄉人關心、照顧，我媽媽和我們弟兄都忘不了啊。」我父親兄弟六人，妹妹二人，這樣一個大家庭負擔之重可想而知，祖母、伯母、母親都要做針工掙點錢補貼家用。但也不是赤貧，赤貧的是工人、手藝人，他們沒有文化，斗大的字都不識。我父親兄弟六人都上過私塾，按照當地的規矩，十五歲（當然是虛歲）外出學乖，就是學生意，到人家店裏做學徒，吃三年蘿蔔乾兒飯，滿師後才能做伙計，就是店員的意思。他們上學的時間不長，可是文化並不算低，我父親的毛筆字比我現在寫得好多了，我四叔經常替人家店寫中堂、對聯，蘸着濃濃的墨落毫在灑金的紅紙上，雍容的神態又浮現在我的腦際。

我父親叫魯鴻煦，字照林，以字行。光緒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四月十二日生，丙午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六去世。他上私塾的課本還保存下兩種，一是《繪圖監本詩經》，「宣統二年五月重校」，「上海會文堂粹記印行」；一是《繪圖監本書經》，「宣統三年孟春」，「上海會文堂粹記書局印行」，都是石印本。父親喜歡吟咏《古文觀止》裏的《弔古戰場文》、《阿房宮賦》、前後《赤壁賦》等，當念到「法重心駭，威尊

命賤」，「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等句時，總是低沉回轉，而吟詠「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聲音陡高，情緒昂揚，晃起頭來。高興起來還跟我講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翻案文章做得如何好，簡潔得不得了。也教我背背短詩，例如「雲淡風清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還謂偷閒學少年」等等。晚上沒事時，父親就跟媽媽、我們姐弟講關公、張飛，講秦叔寶、尉遲恭、程咬金，講岳飛、牛皋，「馬前王橫，馬後張保」，講《今古奇觀》、《聊齋》故事，講《清宮十三朝》、血滴子，講得有聲有色，比我這個職業教書匠的口才強多了。我母親陳文晉（解放初期還叫「魯陳氏」，解放後男女平等，大概是我父親給取了這個名字，我的舅舅都是「文」字排兒），宣統元年（一九零九年）二月十七日生，健在。她是文盲，可是對許多古代故事比一般婦女要熟悉得多，現在看電視，只看古裝戲。我父親愛講歷史故事，也影響到我大姐魯國蓉、二姐魯國芸，幾個月前我外甥袁強從泰州來說：「媽媽（按，指我二姐）看現在的這些電視劇看不懂，見了古戲就喜歡。」

落英（上）（魯）

也深深地影響了我，我愛看史書，至今喜歡作歷史考證。

父親也偶爾帶我去戲園子（方言詞，即劇場）看京戲，進得門裏，只見幾根碗口粗的木樁埋在土裏，再釘上一塊狹而長的粗糙的木板，一排可以坐好幾個人。不時地有「手巾把子」在空中飛舞，很準確地落到某個看客的前上方，雙手一伸就可接住，那是跑堂的工人扔絞乾的熱毛巾讓看客擦臉擦手，也送茶，享用者要多交錢。看客還嗑瓜子、談心。前面或樓上有些打扮得特別招人注目的濃妝艷抹的女人，原來那是「下家」（妓院）裏的，她們看戲「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最怕看蘇三起解，青衣一坐就半天，唱個沒完，我又聽不懂，巴不得她早點起身，換上大花臉，背插四面小旗，長槍短劍，打得多帶勁！在溱潼還有一種草臺戲，在露天場子的一側臨時搭個戲臺，戲子穿上戲衣、爬上去就唱，唱完了就爬下來。他們演出前的化妝和演出後的卸妝都能看到，小孩子的好奇心容易得到滿足。這種草臺戲演的多是「小開口」，就是揚劇的小戲。我看戲不多，就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我幼年喜歡的是聽說書，在泰州大東橋那兒有個書場，靠在城河邊上，書場的秩序比戲園子好得多，說書的驚堂

木一拍，底下鴉鵲無聲。說書的還會點口技，「得得得——得」，模仿馬蹄聲由遠而近，十分逼真。講的多是歷史故事，還大段大段背古文，甚至像《前出師表》都背全文，是用說書的腔調不是吟咏。我那時感到厭煩，但是佩服他的口若懸河，一氣貫注。某晚乘涼時聽父親、叔叔和朋友們議論：說書的對情節、言辭都可以臨場發揮，任意增減，可是背古文時如果錯了一字，掉了一句，就是大忌，因為好些聽眾對《前出師表》這類古文是背得爛熟的，一聽說書的背古文，勁兒就來了，自己在默背，同時也測驗說書的水平。那時聽眾大多數是我父親、叔叔這樣的「小市民」，於此也可見這一代「小市民」們的文化素養。我對說書有好印象，可惜的是聽得少。

溱潼的婦女絕大多數是文盲，女子無才便是德。我大姐、二姐都是解放後才學識字的，一九八零年夏我跟岩田禮先生同去連雲港調查方言，當地人把青年婦女叫「識字班」，即源於此。我三姐魯國茹因為帶着我上學，所以她也能上了小學，五年級時，我祖母在我小姑母的陪同下到我家，嚴峻地指示要將三姐停學，房東朱五老太說情，却不了她的面子，祖母最後勉強同意上到小學畢業為止。但是還沒到小學畢業，

解放了，共產黨主張男女平等，提倡識字上學。解放前婦女們尤其是姑娘們不能去看戲，聽說書，就找熟識的認識些字的小姑娘在家中唱「七字段兒」，記得有位從姜堰來的女親戚識字，就被請來，好幾位婦女聽，姐姐也邊納鞋底邊側着耳朵。一唱就是幾個小時，唱的和聽的大有如癡如醉的樣子，「七字段兒」有唱詞，有念白，唱詞多是七個字，也有由「三三四」組成的十個字的，大概是寶卷之類的東西。內容多是才子佳人，大團圓，一聽到這，我就跑開了，所以「七字段兒」的書名我現在一個也說不出。這種「七字段兒」書攤兒上有得賣，多的是，石印小字，外有一張薄的黃紙，印一點粗陋的畫兒，便宜得很。

偶爾也有些外地要把戲的、玩猴兒的到溱潼來，我還記得幼年在街上看到過一隻駱駝在狹巷的潮濕的青石板路上慢吞吞地牽過。若論隆重熱鬧，莫過於「迎會」了，在某些日子，例如某位菩薩的生日，從廟里把貼金塗彩的菩薩連木頭玻璃龕一起迎出，擡到街上，和尚在前，一大批信徒緊跟，成了聲勢浩大的長長的遊行隊伍，道旁也夾滿了情緒昂揚的圍觀者，可謂「萬人空巷」，幾乎全鎮的八都參與了這盛大

的節日，我是一名小「圍觀者」。還有些虔誠的信仰者向菩薩

「許願」、「還願」，做出了迥異尋常、驚人駭眾的事，例如跳馬皮，鐵絲橫貫口中，透穿兩頰，燒紅的鐵棒烙自己的肢體，信仰使得他們眼不眨，聲不吭，據說也不會致殘，因為菩薩保祐的緣故。湊湊的廟也不少，如關帝廟、都天菩薩廟，有次據父親說，都天菩薩就是死守睢陽「壯烈犧牲」的張巡，我至今仍懷疑，因為父親不是歷史學家。岳王廟的香火也盛。還有東觀，那是道教的。我常跟着母親到廟裏進香，在拜墊兒（即蒲團）上磕頭是小孩子最樂意的事，「速度」、「數量」遠遠超過大人，舊小說裏有「磕頭如搗蒜」這句話，可以移用來，只是「後勁兒」不足，至於「質量」那就對不住了。他如土地廟兒，嵌在路旁屋下的「泰山石敢當」，乃常見之物；狐大仙、「麻虎子」（嚇小兒的惡人，好像在趙翼的書中考證過是常聞之語，至於死了人放燄口請和尚念經之聲係常聽之聲，這裏不再細表。

偏僻的湊湊也有極少數人信耶穌教（當地人哪裏弄得清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統謂之曰耶穌教），我們幾個小學生有次在無意中闖進教堂，一個神職人員來跟我們講上帝怎麼怎麼，

落英（上）（魯）

聽了幾句就走開了。

鎮上有西醫、藥房，更多的是中醫、藥店，普通的病則是在自家的家神櫃上的香爐裏插上香，跪求菩薩保祐。土方、偏方更是多了，有時真靈，跌在地上，碰了哪兒，出了血，大人在香爐裏捏一撮香灰一按。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小時侯在家翻抽屜玩，突然疼得鑽心，慘叫起來，原來一條百腳（即蜈蚣）貼在我的小腿肚上，父親馬上叫人到天井（院子）裏捉來一隻大雄雞，扒開它的嘴，食指在雄雞舌頭上刮取黏液，塗在我的傷口上，真怪，不疼了，也就好了。我絕對保證，沒有塗紅藥水、紫藥水，這些在我現在的家中還不全呢。

就在這樣的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我出生了。我上面是三個姐姐，我祖母魯張氏（光緒七年生）可急了，就去茅山進香。我一直疑惑，祖母怎麼能跑到南京之南的茅山進香呢？前幾年買了本《江蘇省地圖冊》，方知湊湊往北不遠，興化縣南境內也有個「茅山」。祖母在這個茅山求神進香許願，廟主說，出了廟門看見的第一個人如果是男的就會抱孫子。我祖母跨出了門檻第一眼看到的是個種田的，回來果然我母親生了我這個男孩子。「爹爹（祖父，二字湊湊方言皆上聲）歡喜得沒

得命」，特別喜歡抱我，小叔叔對祖父說：「他將來同你點兩個包子。」祭祀亡靈時，長方形的紅紙袋內，包若干枚錫箔折的元寶，用火點燒，一個祖先只派點一個包子。

虛歲四五歲時，父親就教我識字，父親自己寫的字塊是我最早的「教材」，上私塾前我已識上百的字了，在「塘子」裏父親常常以此擺勝（誇耀的意思），他的朋友就來測試我。

塘子，即公共浴室，解放前只有男塘子，從浴池上來後，一二十人圍坐於一廳，大毛巾裹身，飲茶、聊天甚至打瞌睡，用新名詞的話，也是公關場所。溱潼沒有幼稚園，我也用不着上，母親和三個姐姐帶我，綽綽有餘。有一次弟弟腳踝受傷，久治不癒，怕他殘廢，父母親帶他到姜堰求一位傷科名醫。回來後告訴我，在姜堰買了幾本「帖」留我上學用，我當時只知道「鐵」（和「帖」同音），老是不明白，上學用「鐵」幹什麼，疑團蓄在心中數年，後來才知道是字帖，兩面都是木板，經摺裝，拓本。可惜在三年困難時期被父親賣了，文璽舅舅送我的《二十五史精華》等好書也在那時賣了，知道後很懊惱，但也難怪，那時我在北京餓得浮腫，連一層樓梯也爬不動。

陽曆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陰曆壬午年正月初一，到這一天我就是六歲了。「實足年齡」、「實齡」的說法是解放後才知道的。雖然在板壁上貼了紅紙黑字的「童言無忌」的紙條，但是大人年前就多次關照我們要說順遂話，因此大年初一一早上眼睛一睜就連聲說「恭喜」、「恭喜」。我得到的最多的順遂話是「恭喜上學」、「恭喜大了中頭名狀元」。媽媽同姐姐經常同我談到上學的事情，那上學一定是件好事情，大好的事情，幼小的我就一直盼着上學。

這歷史性的一天終於到了。正月十幾吧，早上吃了媽媽早就準備好的「糕」和「粽子」，「糕粽」在當地話裏同「高中狀元」的「高中（去聲）」同音。父親帶着我，拎了些禮物，到儲老先生的私塾去上學。儲老先生的名字我記不得了，罪過。當地有錢人家如陳家就請一位先生到自己家處館，教自家和親戚的子弟，我們家哪請得起呢？一進先生家門，先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前磕了頭，又拜了先生，這就算入學了。儲老先生家的堂屋裏擺了十來張書桌，都是學生家長自備的，因此大小、規格只能大致相似。我的一張書桌還保存下來，自己用小刀在桌面上刻了個「堯」字，現在放在我

兒子明泓的斗室內，是張雙屨桌，厚實，笨重，高度適用於成人。小孩兒個子矮，於是就配有一種特製的「獨橈兒」，一人坐，很高，坐在這種橈子上，小孩兒也可以趴在桌上寫字。橈子過高，小孩兒怎麼上得去？就是被大人挾上去，腿老懸着也難過呀，而且哪能旁邊總有個大人等着挾上挾下？於是在一面約一半高度的地方有根橫木，正像一架梯子，小孩子可以藉此爬上爬下，坐定了可以攔腳，這種橈子的四條腿不是垂直的，而是又開的，不易跌倒，可見設計的合理性。私塾裏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小到六歲，大到十幾歲，教的課本也不一樣，淺到《三字經》，深到《易經》。每天上午學生挨次走到先生的桌前，站立好，先生指着課本教，也復習、抽查上次教的內容。先生教完，學生捧着課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高聲朗誦。學生各自朗讀自己的課本，由於內容極不一致，也就各人只聽自己的聲音，不怎麼受到他人的干擾。好多人特別是「大學生（即年齡大的學生，「大」念陰平調；「中學生」「大學生」的「大」念去聲）」也學起先生來，搖頭晃腦，左右擺起身子來大聲念。從門外走過的行人會聽到一片既和諧又不和諧的讀書聲，大概總比現在商店裏傳出的立體聲收

落英（上）（魯）

錄機放出的「嗚嗚」聲要好些，不那麼令人厭煩，特別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舊社會裏。私塾裏常有體罰，主要是打手心，打左手的手心，因為學生的右手要翻書、寫字，打了不好；更重要的是先生用右手拿戒尺。戒尺是長約四五十釐米的方柱形，木製，漆了紅漆。如果先生生氣，多打幾下，又用點勁，學生就疼得啜泣起來，可不敢大聲哭叫，紅腫幾天也難消，回家會被父母兄姐馬上發現，一方面心疼，一方面說：「必定頑皮，不用功，先生才打的，活該。」絕大多數家長總和先生是「同一戰壕裏的戰友」。現在的中小學班主任還要家訪，可私塾先生用不着，紅腫的手心就是信息的最佳載體，也傳遞得及時。

我是學生中的最低層次，學的是《三字經》，從「人之初，性本善」起，每天學兩句。離開先生，爬上了獨橈兒，就規規矩矩地念、背。就這麼兩句，念到吃中飯，回家後吃過飯再來。就這麼坐了年把。據說，我經常打瞌睡，姐姐來把我馱回家去。我也挨過一次戒尺，什麼原因記不得了，不會是頑皮吧，那麼小，而且周圍都是「大學生」。

那時上學以前只能有小名，我的姐弟和堂兄弟姐妹都叫

「某麟」，我的小名叫山麟（「山」源於我祖母敬香祈禱的興化茅山）。大姑媽嫁到梁家，把娘家的這一「文化」也帶去了，因此我的表弟、表妹也叫「某麟」，而且有兩個竟然全同，於是在需要區別的場合，我就被叫作「大山麟」。上學時就要取個學名，女孩子不上學就沒有取學名的必要。似乎不是「皇考」「錫余以嘉名」，也不是儲老先生取的。我父親一輩都是「鴻」字排兒，到了我這一代，要取新的排兒了。伯父、父親請教了一位文人學士，他拈出八字「國安家慶爲善永昌」，我這一輩是「國」字排兒。取名的先生見我兄弟二人，我是老大，就給我取了「國堯」二字。解放後這名字顯得「舊」，意盎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名字就容易有政治野心的嫌疑，我是小助教，普通羣衆，連黨員也不是，小組長也沒當過，周圍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大學生倒也沒注意到我名字有什麼政治內容，不過終不自安，畢竟至少是「四舊」。文革剛起，破四舊時，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冒出兩三個小年輕攔住我：「你這頭髮是燙的嗎？」我趕緊回答：「不是不是，天生的。」我被放了過去。那時改名字成了風氣，什麼「衛東」、「小彪」、「學青」、「紅」之類的很多，我還是用自己的名字，

但有時給師友寫信時署作「谷瑤」，「谷」「國」在泰州話裏同音。後來某日大悟，自己給自己取了個好字，就對「國堯」這名字理得而心安了。解放前有文化的人才有字，解放後每人只能有一個名字，這取字的傳統就中斷了。我的字是「毗」或「萌」，源於毛主席詩句「六億神州盡舜堯」，現在該是十二三億盡舜堯了。本應寫作「氓一」，不過我怕被人念成「流氓」的「氓」，而且有位大人物叫作「李一氓」的。我在寫論文《隸書辨》時，讀了若干古書，知道「氓」通「毗」，通「萌」，於是就用了通假字。古人死了有「私諡」，我這個活人有「私字」，何以謂之「私」？因爲戶口本上只允許有一個名字。不過我有時把這「私字」作筆名用。

閑話少提，言歸正傳，還是拉回到私塾時代。在儲老先生的私塾裏呆了年把，我就轉到段梅江先生的私塾裏。從一座石橋下來，向右一折，是條石鋪的河邊道路，第一家就是段先生家，進了大門是天井，磚鋪的，朝南一進住家，朝北一進的堂屋是私塾。段先生是本地人，有學者的風度，段師母好像是外地人，胖胖兒的，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生，那時在溱潼，高中生就是大知識分子了。兩人回得家鄉來在家開私

塾，都教學生，女的當私塾先生，就是一項「重大改革」。段師母還教英文，捧着一本厚厚的書站在前排書桌（也是學生自備的）前念，念得很好聽。我哪裏够資格去學英文呢？那是大（去聲）學生學的，當然是他們的家長要求先生教的。這兒不打戒尺，也沒有什麼其他體罰，先生都蠻客氣的。我不再念「三百千」了，學的是小學的國文、算術課本。也有休息，可以在天井裏甚至到門外站在河堤上，腳旁不遠是碼頭，婦女們蹲在跳板上手執捶棒敲打衣服，壓去皂角水（那時用皂角擠汁洗衣服甚至洗頭、洗澡，解放初期還用它），有節奏的搗衣聲和行駛而過的船夫拔篙出水聲配合，自然諧和。忽聽到身後有人喊，我們就躡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離家遠了些，因我小，父母親就叫三姐帶我去上學，她也上，學的東西一樣。

二

過了一年左右吧，段梅江先生到公立溱潼小學當老師去了，段師母沒去，但是私塾停辦了。因為段老師的關係，我們魯家幾個學生（還有堂弟、堂妹）未經考試，按大致水平做

落英（上）（魯）

了溱潼小學的插班生。這裏要補敘一下，父親和伯父及叔父們滿師以後本來在外地當店員，慢慢地積攢了些錢，回到溱潼合開了片米店，再後來又買了部十八匹馬力的碾米機，雇了機師和工人，就成了米廠。我們上學之前，在店裏擺了兩桌酒，宴請溱潼小學教導主任袁白華先生、段梅江先生等。

當地人把小學、中學都叫做學堂。上學堂了，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兒啊。故總書記胡耀邦在職時喜歡題字，常用「更上一層樓」的詩句，如果用這五字形容我從私塾到了學堂，是再恰當不過的了。上學堂就要有個上學堂的樣子，「裝備」要「現代化」，於是父親領我到大街上的一家書店（那時的書店多兼營文具）購買文具用品，鐵皮文具盒上印了花綠綠的畫兒，真是漂亮！剛踏進家門，就忙不迭地把這些文具拿出攤在桌上，一一欣賞，好不快活。忽然發現蘸水鋼筆尖有毛病，急得哭了，你看，中間圓孔往下裂出一條縫，直到尖兒，不是壞的是什麼？鬧着去換，店主說：「就派這樣子。」

學堂同私塾果然不同，溱潼小學占了中心區的一塊正方形的地方，好大，十幾個教室都是平房，排成了幾排，中間

是空地，寬敞，乾淨。進了校門，就是幾棵大樹，濃蔭蔽地，夏天尤其感到清涼。進了教室，課桌課椅都是一色，一排排，整整齊齊。同一班的學生才在一塊上課，不再是「多層次複式教學」了。這一課的老師下了課，換另一個老師來上另一門課。同學們在課間都湧出教室，在太陽底下跳跳蹦蹦，打打鬧鬧，開始的幾週內，課上到一半我就有點蠢蠢欲動，巴着下課活動了。

有時我們正在上課，全神貫注看着老師和黑板，忽然間有一同學側首向左看，於是我們的視線也就跟着「左傾」，只見關着的玻璃大窗外兩三個中年婦女正往我們教室裏瞧，還指指點點，甚至觸及玻璃，偶或幾句「竊竊私語」，但那是聽不見的。看不出什麼名堂來，學生們的視線就又移向正中，至於這幾位「窗外女」何時離開，就不知道了。類似事情不時發生，漸漸地我們也知道了，是相（去聲，動詞）親的。解放前封建包辦婚姻，女孩子十歲左右，自己還不懂事，父母、親戚（女姓居多）、媒人就來操這份心事。小地方，幾乎人人都能拉上親戚、熟人的關係來，學堂看門的工友就放這些「女奶（去聲）奶（陰平）」（指婦女，帶鄙視意味）進來。被相的

多是男同學，下課後他就成了我們嘲弄的對象，他的臉要紅到頸項。

對學堂的老師，我們都很佩服，有位常識老師，小分頭，擦了凡士林，頭髮烏亮亮的。每次上課都要捧幾本厚的洋裝書往講檯上一放，這些書比《岩波國語辭典（第三版）》厚些，比《現代漢語詞典》薄些。我們哪見過這麼厚的洋裝書？尊敬之心油然而生。開始不敢去看那些洋裝書是什麼，過了一段時間，下課時老師被一些學生拖住問問題，乘他顧不及收拾書的時候，我們就迅速地伸手把書面合上，封面或書脊上的書名就擋不住了。原來是《高中化學》、《范氏大代數》之類的書，紙硬面精裝，我們小學生越發佩服了。

高小的課程跟現在差不多，現在叫「語文」，那時叫「國文」，那時也有政治課，叫「公民」。我的副科不行，「五音不全」，又常害病，有一年打了兩次擺子（即瘧疾），中間又插了個出疹子（即麻疹），媽媽都怕我活不成，體育成績哪還能高？勞作課要做小手工，課上往往做不完，就回家做，我倒也認真做，但總是做不好，急得哭起來，這時媽媽就責成姐姐代做，我才收淚去睡覺，第二天吃過早飯拿着姐姐捉刀

的成品交給老師，有時還能得好評。

我的算術考分還可以，但實際上平平，那四則運算題有時也繞人，特別是什麼鷄兔同籠，算多少條腿，現實生活中何嘗有鷄兔同籠？

我喜歡的是國文和常識，國文教科書裏大多是白話文，也常做作文，好像都是命題作文，不像現在有什麼速寫和改寫。每學期舉行作文競賽，我也得過名次。校裏也定期舉行演說競賽，那時推行國語，當然要講國音，演說辭事先由國文老師改好，參賽的學生背熟了，甚至手勢都由老師導演。競賽時場面隆重，校長、老師、學生都來，我們只有聽的份兒，因為我們只能說方言，但是國音我們完全聽得懂，再配上抑揚頓挫的語調，感到親切悅耳。

老師還要求我們看課外參考書，推薦開明書店的《精讀文選》，共四冊，所收多是名家的優秀散文，有朱自清的《匆匆》、《背影》、《荷塘月色》，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李大釗的《今》等，有的文章我們甚至全篇都背了，我們小學生都很崇拜名家，喜愛名篇。

我們還自己買書，我在泰州比在溱潼買得多。由於在泰

落英（上）（魯）

州開米店的大姑父的建議和努力，魯家的這個小碾米廠，在抗戰勝利後不久搬到泰州北門外東街覺正寺旁。覺正寺，泰州人說成「覺禪寺」，小廟，但因肉身菩薩而聞名遠近。早年廟裏有位老和尚圓寂了，道行高，真身不壞，徒弟們就在肉身上貼金，但是右手食指貼不上，據說是因為拌貓兒飯，碰上小魚的緣故。父親常在肉身菩薩龕前跟寺裏當家和尚談心（聊天的意思），所以我也經常看到肉身菩薩坐像，泛出金光，解放初期還在的。肉身菩薩是從禪宗六祖慧能開始，一九八八年初夏我遊九華山（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時，見那裏也有肉身菩薩殿，這兩個肉身菩薩終於保存下來，實是不易。店既搬到泰州，我每個假期都要到泰州父親身邊過，泰州城裏的書店、書攤比溱潼多得多，可吸引人啦。我得到的零用錢從來不買吃的、玩的，就買書，大（陰平聲）人認為買書就是好，也不太管買的是什麼書，聽到要錢買書就給，甚至還多給些。

我買的書有《小學生模範作文》、《中學生模範作文》之類，至今還保存一本《小朋友遊記》，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上海四馬路畫錦里春明書店出版。這類書顧名思義，是小

學生或中學生作文的選編，當然不及名家的好，可是這是同齡人寫的，內容、感情跟自己一致，看看就可以相通，做作文時很派用場，抄的倒很少，而是模倣寫法之類。《中學生模範作文》裏的文章長些，高明，買這種書是「取法乎上」。此外還有《發明家的故事》，因此愛迪生孵雞蛋的故事便從我口中講出，回家時的路上居然有些同學願意聽。

我還買過一套上海大公書局刊行的《現代文藝選輯》，封面上有「中學生之課外優秀讀物」十字，入選的首為魯迅，其他有巴金、朱自清、葉紹鈞、冰心、王統照、葉靈鳳等。保存到今天的只有《魯迅傑作選》一本了，收了十六篇散文，如《踢》、《祝中俄文字之交》、《我們不再受騙了》；四篇小說《阿Q正傳》、《示衆》、《藥》、《孔乙己》，我在高小時代就讀過《阿Q正傳》了。

我們從國文教科書、從老師推薦的課外讀物，從自己買的書中學到了一套書面語，也就是我們作文的語言。我們從小學時代開始寫的作文就跟自己的方言大不相同，泰州話（溱潼話是其一支是官話區最南的一個小方言，除了語音外，詞彙和語法上也有許多特異之處。我的岳母吳錫珍（一九一七

年生）是地道泰州城裏人，現在住在我家樓下的一位揚州籍中年婦女就不大聽得懂她的話。我們寫作文時不用這種土語，我們在學堂裏努力學習的是白話文，耳濡目染的都是這類文章，搖起筆來，這類文章的詞兒和句法自然奔到腦中，注到筆端。我們這一代人同五四時代首批寫白話文的作家、學者不同，葉至善在《中國現代作家選集·葉聖陶》「編後絮語」述及他的父親，「他說他在學校裏讀的是文言，寫的也是文言。五四前後提倡寫白話文，寫出來的其實是四不像：文言的成份還相當多；又攙些外國腔，是從當時那些生硬的翻譯文字學來的；再加上些舊小說中的古代口語和別地方人不能懂的蘇州方言。」顧頡剛在其《古史辨》的著名長序中說，他寫文章是先寫成文言，再自己譯成白話。我們是四十年代的小學生，我們的書面語是從五四開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熟的白話文。而且這種書面語影響甚至支配了我們的口語，我們從外地回鄉探親，語音可以迅速地改回來，如果同家人談家常瑣事或地方風土人物時，可以在當時環境和家人士話的刺激下，部分復活腦中處於壓抑狀態下的方言詞彙和語法。但是如果談到文教衛生、科學技術、國內外大事，

談話的雙方所用的詞兒和句式很難跟土話趨同，有一年回鄉，我的一位親戚說：「國禿的話文雅。」其實我回去就很注意，不能使親戚朋友說我洋起來了，可是長期形成的知識分子腔改不掉。因此我認爲我們這一代人的書面語以及大部份口語是從現代白話文學得的，也許不是過激之辭吧。

到了高小，懂得讀書了，開始閱讀中國古典小說了，男孩兒都這樣，首先看的是《水滸》和《西游》，接着是《三國》。這些書幾乎家家都有，有上海書店的鉛印本，也有金聖歎批本的石印本。《水滸傳》是最早看的，像三拳打死鎮關西，景陽崗打虎，江州劫法場等，都熟透透的，一百單八位好漢的名字、綽號、位次滾瓜爛熟，是男同學中互相考問的題目，回答時脫口而出方稱得好。按，在小學和中學，男同學和女同學是不說話的，如果說一句話，被別的同学看到，要取鬧好長時間。我們看的《水滸傳》都是七十回本，熟悉的是前面大半部，魯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的所作所爲真帶勁兒，吳用佩服他點子多，宋江沒味兒，動不動就「親解某人之縛」。後面小部分看得馬虎，因爲沒有先前衆好漢沒上梁山那樣熱鬧。小學生看水滸說懂也懂，說不懂也不懂，

落英（上）（管）

那時是從頭看到尾的，但可不是一字一字兒看的。要是逐字看，我現在也只能承認不懂，那麼多元明的俗語詞怎能都猜出意思。那時是看情節，「不以辭害意」，某人追殺某人，「欲知後事如何」，急着看「下回」如何「分解」。記得有一年回家，外甥吉瀚濤正上小學，一邊筷子夾着菜塞在齒外不動，一邊眼睛在左側的《水滸》上閃動，不時伸左拳踢右腳，我母親直吆喝：「快吃快吃！」「別把飯碗打了，別把湯潑了。」我不禁笑起來，這不就是活脫脫的二十多年前的我嗎？

《西游》也是叫我們男孩兒忘餐廢寢的，開天宮前後最過癮，看到人參果一段，也要流口水。孫猴兒、豬八戒討人歡喜，沙和尚跟在後面跑腿兒罷了，唐僧軟耳朵，聽讒言，就會念緊箍咒，沒得用。對書中大段大段描寫性的詩詞，我們都是跳過去，誰有那份耐性？有時看到「紅氍黑子」「告誦」這些詞兒，「嘿，我們這兒話不也這樣說嘛。」

接着就是《三國志》，我小時候從不說《三國演義》，大了才知道是兩本書。什麼桃園三結義，三英戰呂布，三顧茅廬，多麼吸引人！奸雄曹操叫人痛恨，長坂坡的趙雲，定軍山的黃忠，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真是英雄，劉備假惺惺的。

不知怎麼搞的，這些書中的「第一把手」（用這文章以來的詞兒尙稱恰當）劉備、宋江、唐僧都是軟綿綿的，提不起神來。看到諸葛亮死後，心情沉重，「大勢去矣」，書也就大致上翻完了。《三國演義》有大量文言，論小學生的水平，好多是不能懂的，但是我們都看了，都「懂」了，這是不求甚解的「懂」，倒有點相當於現在的「快速閱讀」法。

還看了許多歷史小說，如《說岳全傳》、《洪秀全演義》、《隋唐演義》、《說唐》、《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上海出的，封面印得色彩斑斕。我們那兒的各種書幾乎全是上海出的，北平的書不到那兒，南京就沒印什麼書。

看了這些書後，有了資本了，每逢父親講故事時，我聽得更更是眉飛色舞，有時還插嘴：「書上不是這麼說的嘛。」書上還有……」

《三俠五義》、《小五義》之類武俠小說也看了不少，男孩子們在課間，更多的是在散學回家的路上，往往來個「黑虎偷心」、「雙風貫耳」、「掃堂腿」。書上常常提到「腦後生風」，無奈我們功夫不夠，怎麼也感覺不到。忽然被從腦後伸來的

雙手掩住眼睛，或者攔腰一抱，踉踉跄跄地攆倒在地。有時樂極生悲，衣服撕破了，回家少不了要挨一頓罵；手撐地擦破了皮，有時倒能蒙混過關。

男孩子們喜歡英雄傳奇、武俠小說，女同學甚至到了中學，也少看或不看這類書，她們幹什麼去了呢？大多幫助媽媽做家務，帶弟弟妹妹。那時的家庭子女多，男孩子的待遇比較優惠，可以「遊手好閒」，做完了功課，甚至沒做完就

看這類「閒書」（對課外讀物的貶辭）。

小時崇拜英雄，羨慕俠客，到頭來俠客做不到，英雄做不了，倒落得個大近視眼。散了學，回了家，看那上海書店印的五號鉛字，行距又緊的小說，天暗了，就跑到天井裏看，眼睛睜得大大的，直到被媽媽或者姐姐叫回屋裏去，但是在豆油燈下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時溱溱已有了私人開的電燈廠，可是居民們仍然點豆油燈，燈柱上有个燈盞，瓷的或銅的，盛了食用的豆油或菜油，兩根燈草芯吸油，一頭伸向盞外，點火，「一燈如豆」，慢慢地那如豆的燈光在縮小，變暗，用一根銅棒兒捺着燈草芯再往外伸，在這樣的光線下看書哪能不近視？後來我每當眼疼，就想起那位「德月」的祖

先，必也近視無疑。

我還買過《小學生升學指導》、《升學指南》這樣的書，厚厚的，各科都有，大開眼界，什麼「我國四大古鎮」呀，「四大米市」呀，「佛教四大名山」呀，等等，看多了，也就熟了，常常拿來炫耀自己，出題目問同學，若是答不出，就更得意，也就更要去看，甚至上課時也偷偷地看，也就更容易記得，這也算是良性循環吧。

這裏我要敘述一下朱成功叔叔的影響。朱叔叔抗日戰爭初期是高中生，帶了母親和弟弟逃難到溱潼，是我家的鄰居，處得很好，後來去了大後方，丟下了一些書在我家。記得最清楚的是《高中世界歷史》，商務印書館出的，金兆梓編，很厚，插圖多，雅典娜神廟的圖片，彩色精印，最後一圖是蘇俄的工廠。書上有朱叔叔的朱印，我高小時就經常翻讀這本書，這時母親就講朱叔叔如何如何好，朱叔叔常指着我，對我祖父母、父母講：「這孩子大了要給他上學。」那時上學，每年要交多少擔米學費（那時論米計價），哪裏交得起？十五歲就去學乖成了「家規」，所以我們魯家及親戚都是店員或小商人，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媽媽老說：「大了要像朱成

功叔叔那樣滿肚子墨水。」一九五四年我在揚州上學時，見到《中國青年報》上有關於清華大學教師朱成功的報道，告誡（即告訴）父親，父親試着寫了封信，居然聯繫上了，來信建議投考清華，我却上了北大。這可以說是緣份吧，讀了朱叔叔的書，我也居然成了讀書人，只是沒有滿肚子墨水。

倒不是爲了寫這「遵命文章」而只談小學時代的讀書生活，實在除了讀書外，我高小時代「他無可稱述焉」。看戲、聽說書在上面已講了。平田昌司先生的《幼少年時期語言生活調查表》的一個問題是「第一次聽到廣播是什麼時間？」我的回答：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吧，我到一個同學家玩，他家是大地主，好幾進房子，鋪的籬底磚（大型方磚）。他父親是少爺，在家裝收音機，一個個閃光的玻璃管使我看得發呆，他父親將兩隻耳機從自己頭上取下，套在我的頭上，忽然樂聲在我耳旁響起，美妙無比，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洋玩意兒」。直到一九七六年春我才買了一隻半導體（只有中波）天天撥弄，十來天後的某晚，忽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的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嚇一大跳。解放前溱潼好像沒有電影院，一次無聲電影給我留下了印象。抗戰時，泰州、溱潼是

國民黨李明揚、李長江的地盤，後來李長江投敵，引來了日本侵略軍，溱潼搞了個長江公園，那無聲電影就是在公園裏放的，一架一架的日本飛機俯衝，煞是嚇人。抗戰勝利後，四開、對開的美軍宣傳畫也到了閉塞的溱潼，畫的是美軍與日軍在關島、馬紹爾羣島的爭奪場面，鋼盔、大炮、飛機，色彩鮮艷。這些宣傳畫被居民們糊在板壁上。至於報紙，居民們文盲居多，當然談不到看報的問題，《申報》大概是最有影響的報紙，因為當地人管廢報紙叫申報紙，安徽人也是這樣。解放前溱潼人很少有家庭訂報紙的，即使在我今天的家庭裏，前幾年還訂了幾份報紙，隨着報價的不斷上漲等原因，就只剩下一份《揚子晚報》了，似乎左鄰右舍如我這樣的教授、副教授們的情況大致相似。

小學六年級上學期期終考試一完，我就到了泰州父親身邊，這是一九四九年初，陰曆年前。父親見我喜歡讀書，小學又快畢業了，下決心化一筆錢給我買本大型工具書，請教了些「通人」以後，便帶我到書店買了部中華書局的《辭海》，三十二開本，兩巨冊，紙面精裝，前面有很多名人如陳立夫、周佛海等的題詞。我從未擁有過如此厚、如此大的書，愛不

釋手，經常捧着看，那比《升學指導》不知強多少倍。按理，工具書是查的，但我現在還有時去讀，因為我不懂或半懂的大多了，我的這一習慣是在小學時代養成的。父親當時沒買商務的《辭源》，是因為聽從了朋友的意見，我也因此和《辭海》結了緣，後來成了新《辭海》一九七九年版、一九八九年版的「主要編寫人」，看來至少還可以再參加一九九九年版的編寫。

那時淮海戰役已近尾聲，國民黨的散兵遊勇到處可見，傷兵在泰州街上橫行強討，人人害怕。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即陰曆戊子年臘月二十三夜泰州解放了，牆上隔不遠就貼着八開的報紙《鹽阜大眾》、《江海導報》，大字標題：「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揚州」、「我解放軍解放泰州」，沒有抵抗，國民黨的軍隊都逃到江南去了。不久就有了中國人民銀行，有了新華書店，我大概是泰州新華書店的最早顧客之一。看看共產黨的書店到底是什麼樣子，賣什麼書，我走進了新華書店，它座落在天祿街靠坡子街的一頭，朝北，一進門，是過道，向左一拐是一狹長的天井，朝南的正屋，油漆的柱子，籬底方磚鋪地。沒有櫃臺，好幾張方桌，擺滿了書，整整齊齊

齊，任人取看。新華書店的人都穿灰色軍服，只是胸前沒有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扎腰帶，女的也帶軍帽。態度好極了，現在新華書店的那些「小辮子」（北京人對年青女售貨員的稱呼）哪能比啊。這裏沒有舊小說、「七字段兒」、古書，也不賣文具。書全是老解放區來的，紙質、印刷都差，封面色彩不艷，但是另一番風貌，又便宜，我陸續續買了總有一二十本，記得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傳》，六十四開本，薄薄的，稱陳毅是儒將，林彪喜歡吃炒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每一節的標題都用黑線圍成一個方塊兒，這種格式現在已不見了。還有矛盾的《腐蝕》，墨色不濃，但行距較寬，是一九四八年蘇中新華書店印的，我覺得有文物價值，一直保存着，去年送給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今井駿先生，我的子女都不搞我這一行了，他們不懂，會當廢紙扔掉的。

過了年，我回到溱潼開學，校長、教導主任都換了人，「公民」課也沒有了，新的政治課叫什麼名稱，教些什麼，記不得了，只記得有次課上一個同學問到馬克思和列寧。新華書店的書開始在同學中流傳，如《自然和人》、《龍王爺和

落英（十七）（魯）

下雨》、《老鼠》，也有小說、民歌。有些書是韜奮書店印的，大概是蘇北老解放區的以鄒韜奮命名的書店。

因為是最後一個學期，看「閒書」的時間大為減少，我們都在校長、老師的指揮棒下，埋頭於畢業考試和升學考試。我的小學畢業證書正中上方是毛主席像，蓋了兩方朱印，一是「泰縣縣立溱潼小學校鈐記」，一是「興化縣政府印」，證書上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這份證書可證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仍以中華民國紀年，此時溱潼當屬興化。而泰縣縣志辦公室編的《淮東古邑——泰縣》（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載「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七月」「溱潼區屬興化縣管轄」，「一九四九年七月」「溱潼區劃歸泰縣管轄」。也許歷史學家對這兩件文獻要進行考辨了。我的觀察是，證書原件「中華民國」、「年」、「月」、「日」是印的，「三十八」、「九」是毛筆字，填上的，吸墨不充分，顯然是中間隔了縣政府印的紅色印泥的緣故。

（追記）この文章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に京都大學文學部の主催で行われた講演内容に基づき、大幅に加筆されたものである。